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之路”

——中国诺斯洛普·弗莱研究卅载回眸

慕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要:在文学理论研究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向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弗莱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随着我国研究者对西方文论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弗莱研究进入发展期,批评方法日趋多元,研究视野日益开阔;进入新世纪,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渗透下,弗莱批评理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开发。而在与我国本土批评语境结合的过程中,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思想也日益成为我国研究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批评之路”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弗莱研究;范式;批评语境

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1)06-0081-07

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是20世纪加拿大最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20世纪50年代,弗莱的崛起让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逐步摆脱“步人后尘,毫无创新可言”^[1]的尴尬局面。他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终结了英美“新批评”曾经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结构主义的批评时代,是西方文论史上的里程碑。实际上,弗莱的身份很难用“加拿大文学批评家”来概括,因为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加拿大和单纯的文学批评领域。弗莱批评理论丰富的内涵为研究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阐释视角,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研究者共同的财富,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适逢弗莱逝世20周年,2012年又将迎来弗莱诞辰100周年纪念,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回顾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弗莱研究不仅是对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最好的缅怀,也为反思从而更好地继承弗莱留给我们的“遗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20世纪80年代:学术范式转换推动下的研究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教化功能,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话语,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选材。因此,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2年出版《现代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文选》,引入原型批评,但只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原型批评学派的代表性论述,并没有涉及弗莱的开创性贡献。^{[2](156)}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新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多元化为主要标识的社会文化格局影响了受众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形成了新的社会诗学,逐步改变了我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和范式,由此带动了我国对以弗莱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刊登了张隆溪的论文《弗莱的批评理论》,标志着我国弗莱研究开始起步。该文以弗莱的名著《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1957,也译为《批评的解剖》)为参照,深入、客观地分析了弗莱的文学批评体系和思想。论者认为,和“新批评”相比,弗莱的原型批评“眼光更为远大,更有系统性和规律性”^[3]。而对于弗莱批评理论的缺失,论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弗莱的批评理论虽有一套看起来十分严整的概念结构,但由于他把批评局限在艺术形式的研究方面,所以他的理论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9&ZD071)

收稿日期:2011-03-10

作者简介:慕亮,男,山东高密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为一个体系来说是空洞的、抽象的”^[3]。在其后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张隆溪再次评价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其优势在于“从大处着眼,眼界开阔”,不足之处在于将批评和判断对立看待,“不能细察艺术作品的精微奥妙,不能明辨审美价值的上下高低”^[4] (69-70)。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一书中从正反两方面解读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原型批评“有助于文学知识的系统化,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但“将认知理解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主张唯科学主义”是其局限所在。^[5] (270)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著中叶舒宪还参照弗莱的叙述程式理论重构中国上古神话宇宙观的模式系统,是国内较早运用弗莱的批评理论解读中国文化现象的尝试。另外,胡经之和张首映编写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也讨论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其在提高文艺学地位、扩充文艺学研究内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缺陷在于用共性取代个性,忽略社会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译介方面,《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选译了弗莱为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撰写的“结束语”。虽不是长篇大论,但该文深入分析了加拿大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曾经两次被收入弗莱文集,是一篇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和弗莱批评思想的重要文献。《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选译了《批评的剖析》的结语;《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译介了弗莱的两篇文论,并在“现代作家小传”中简要介绍了这位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巨擘。

20世纪80年代我国研究者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学界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认识水平,为之后的弗莱研究奠定了大致的基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弗莱研究并没有局限在弗莱理论本身,而是有所扩展和升华。譬如,在“弗莱的批评理论”的结论部分,张隆溪借分析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之机,讨论了文学批评中如何看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一经典话题,辩证地指出“在文学批评中,片面强调形式固然错误,但脱离文学形式空谈思想内容,也同样是错误的……所以无论怎样先进的思想内容,在没有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之前,就不成其为艺术。”^[3] (129) 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

出“原型批评并不象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研究,它力图透过具体的、可变的作品内容去把握抽象的、普遍的内在结构,这就是说,它把内容上升为形式,它所要把握的形式不是舍弃内容的空壳,而是内容本身的结晶。”^[5] (119) 形式与内容实际上是文学独立性和文学社会性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可以说,张隆溪和叶舒宪的观点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强调文学独立性和淡化文学社会性为特点的社会诗学的产物,契合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向。

二、20世纪90年代:学科交叉和比较视野中的横向拓展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传播与积淀,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身生存的理论土壤,渐渐融入中国的批评语境,而我国研究者也开始脱离对理论的感性认识,从学理层面对西方文论进行深入阐释和爬梳,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元。另外,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文化格局,也强化了我国外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跨文化意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弗莱研究也因此呈现出新气象。

这一时期的弗莱研究仍旧始于对弗莱批评方法的宏观评价。盛宁的《“关于批评的批评”——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分析弗莱的批评思想与“新批评”和传统神话批评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弗莱与结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理论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悖论。同张隆溪和叶舒宪的论述一样,该文也以弗莱的理论体系为例,探讨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指出“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似乎不应该永远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上兜圈子,如果承认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那么不妨再迈出一步,切切实实地研究一下形式究竟是如何对内容产生反作用的。”^[6] 不难看出,盛宁和张、叶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举办了弗莱研究国际研讨会,“不仅巩固了弗莱研究在中国的坚实基础,而且将弗莱研究引向纵深发展”^[7]。一个重要表现是弗莱的多部重要著作(包括论文)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译介,比如《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7)、《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和《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等。^①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开拓了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催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弗莱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宏观梳理和对比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侧重《批评的剖析》,重点解读弗莱的象征和原型理论。王世芸的《关于神话—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和王钟陵的《神话—原型批评之我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都将弗莱的理论置于神话—原型批评的谱系中考察,分析其创造性和局限性。朱立元高度评价弗莱的方法论,认为其有大局观,“注重学术性与科学性”,“体现了论与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8]。王逢振以《批评的剖析》透视弗莱的批评思想,认为弗莱的理论与“新批评”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历史本身的广度和集合结构,在文学中找到了一种历史的替代……要求一种比‘新批评’更强烈的形式主义”^{[9][170]}。张辉也以《批评的剖析》为例,通过对比荣格和弗莱的原型理论,分析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于丰富和拓展文学形式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厘清弗莱“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批评思路。^{[10][160]}丁尔苏在《弗莱“象征理论”的符号学解读》(《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1996)中同样聚焦《批评的剖析》,解析“象征”与“原型”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对于建构一个更为完备的符号学体系所具有的意义。

除了进行跨学科的对比研究外,我国研究者还从跨文化角度对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我国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双向比照。叶舒宪曾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的研究路径更加具体。他的《原型与汉字》(《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1996)一文以中国文化传统观照弗莱的批评理论,尝试通过发掘汉字和神话文本中的原型资源,揭示中国文学与原始文化的内在关联,借此对原型理论作出补充。刘乃银的《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图式》(《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1996)解读弗莱的文学体系论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以后者为参照分析前者的不足。王亦蛮的《弗莱的象征系统与中国大代码比较研究》(《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1996)解析《易经》与弗莱的批评体系在宏观架构方面,以

及《易经》中的卦象体系和弗莱的象征系统之间的共通性,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思考主体在观察自我与外部世界时共有的认知途径。杜昌忠的《论弗莱之文学循环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以弗莱的文学循环说比照《文心雕龙》,认为二者都致力于探求文学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不同在于后者在关注文学形式的同时还看重文学内容。吴持哲先生则从结构、主题和人物等方面全面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资源,是对跨文化视域下弗莱研究思路的一次梳理和总结。^[11]

除《批评的剖析》外,我国研究者还开始关注弗莱的其他著作,例如弗莱批评生涯后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1982)和《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Words with Power: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1990)。杜昌忠的《论弗莱之语言发展循环说》(《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和《论弗莱的超学科文化批评》(《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都以《伟大的代码》为例,分别解读了弗莱对人类语言发展史的划分,以及弗莱批评体系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曾勇的《从宗教意义上的统一到文学意义上的统一——读诺斯洛普·弗莱的〈权力的词语〉》(《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解析弗莱在《神力的语言》中如何通过研究创世神话中的暗喻,完成宗教统一性向文学史统一性的投射,从而使文学史的研究系统化。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弗莱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梯队,除我国本土研究者的贡献外,执教海外的华人学者也奉献了他们的智慧,为我国的弗莱研究添砖加瓦。美国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的论文《弗莱和文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西方和中国》(《弗莱研究:现状与展望》,2001)从跨学科和跨文化角度,以精神分析学观照弗莱对虚构文学作品五种模式的划分,定位与这些模式相对应的中国文学作品,以此探讨阐释中国小说内在发展规律的新视角。杜克大学刘康教授将弗莱的文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统摄于现代性和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二者的共通点。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弗莱象征理论的建设性阐释,该文认为弗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尝试在文

化层面上表达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关怀,而这种文化性普遍主义话语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因此三者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致性。该文进一步指出,这种一致性的深层原因是美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位置,不同于特里·伊格尔顿对“美学意识形态”的理解,美学话语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只起反抗和颠覆的作用,“更包括了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方面”^[12]。对于弗莱批评理论中的乌托邦意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谢少波教授也曾作出过精彩论述。他首先阐述弗莱的批评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乌托邦叙事方面的一致性,继而解读詹姆斯如何在将弗莱的乌托邦文化观历史化的基础上对其叙事和欲望理论进行挪用,从而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谢少波看来,詹姆斯对弗莱的挪用,其目的在于“突出文本和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13][95]},因为“弗莱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同社会政治生活分开,而詹姆斯则试图辩证地思考这两种现实”^{[13][96]}。刘康和谢少波虽然都对弗莱和詹姆斯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对前者来说,詹姆斯是参照,用于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对后者而言,弗莱是参照,用于说明詹姆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逻辑建构。虽然目的不同,但二者的论述无疑都揭示了弗莱理论的政治内涵。在当时我国本土研究者普遍关注弗莱批评体系外在结构的情况下,这种深入考察批评理论内在肌理、挖掘理论潜能的做法是非常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也的确为之后我国弗莱研究的转向做了铺垫。

三、新世纪:与本土批评语境结合过程中的纵向延伸

我国的当代西方文论研究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继续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在不断消化与吸收西方文论的过程中,我国研究者逐渐将西方文论的批评术语转化为批评思想,将西方文论的批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批评思维,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西方文论研究的学科交叉和比较意识更加突出,不同理论间的对话和借鉴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在总结我国引入和运用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我国研究者的反思、批判和本土意识不断增强,开始自觉地寻求西方文论与我国本土批评语境的契合点。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渗透下,弗莱批评理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出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多元研究格局;同时,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思想日益成为我国研究者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批评实践得与失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彰显出它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新世纪的弗莱研究既有对弗莱具体批评著作的深入解析,也有对其批评体系的宏观观照。蒋显璟的《弗莱对〈圣经〉的神话结构主义解读》(《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以《伟大的代码》为例,解读该著对《圣经》的结构主义阐释。他的另外一篇文章《神话与科学:弗莱理论中的不协和》(《国外文学》2007年第4期)聚焦《批评的剖析》,阐释弗莱批评理论的内在矛盾性。陈建中的《弗莱模仿论的象征体系》(《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以《批评的剖析》为例,分析弗莱如何建构综合象征论和模仿论的原型批评体系,尝试厘清弗莱批评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宏观研究方面,朱刚的《经典的重现与“理论”的沉浮——从〈批评的剖析〉英文版在国内出版说起》(《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将《批评的剖析》置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背景中考察,从中透视20世纪下半叶西方批评理论的流变。梁工从宏观上解读圣经文学研究在弗莱批评体系的重要位置,认为弗莱“文学批评事业的起点和圆心皆为圣经文学研究”^[14]。

纠正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认识偏差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弗莱研究的内容之一,说明我国学界对弗莱的理论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神话—原型批评的重要理论意义之一是,它改变了对以文学体裁和流派划分为基础的传统文学史的认识,建立了以原型的“置换变形”为基础、致力于揭示文学史的内在演变机制的科学文学史观。李维屏和周斌的《洗尽沙砾还金来——谈弗莱原型批评文学史观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深入分析了弗莱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所体现的“生存之链”历史观,是对国内弗莱原型批评的文学史观研究的重要补充。王进芳尝试通过辨析弗莱批评理论中如原型和神话这样的关键概念,澄清国内学界对弗莱理论的误读。^[15]代云红则另辟蹊径,揭示了约翰·罗宾斯和维科等学者的口语文化思想对弗莱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弗莱与结构主义思想的不同在于“他的文学理论包含着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两极性心理反差的历史维度以及对两种文化的思想和表达特征的分析”^[16]。此外,该文还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

有关口语文学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论争为例,探讨了弗莱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研究“已成为继国际性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后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理论课题”^{[17][181]}。因此,从文化角度解读弗莱的批评理论就成为我国新世纪弗莱研究的一个主流批评策略。在1994年北京大学举办的弗莱国际研讨会上,著名弗莱研究专家A. C. 汉密尔顿(A. C. Hamilton)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弗莱是一位文化批评家,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某一阶级或某一地区的西方文化感兴趣,而且还因为他是从总体上观照西方文化,探讨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18]这一评价准确定位了弗莱的文化批评家身份,也成为数年后我国学者从文化角度研究弗莱的先声。程爱民、王宁、叶舒宪、江玉琴、易晓明是国内从文化视角研究弗莱批评理论的主要学者。程爱民在其文章中追溯了弗莱与马克思和奥斯瓦德·斯本格勒之间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弗莱的‘整体文学观’和‘文学循环发展论’使得他的原型批评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19]何志钧、马建英的《宏大的叙述——弗莱整体性文化批评观的生成与向度》(《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王宁认为,弗莱的批评实践具备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双重属性,所以“从北美以及国际的理论视角来看,弗莱应当被看作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前驱者之一”^[20]。在《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观探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等系列论文和专著《理论的想象——弗莱的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中,江玉琴全面阐述了弗莱的文化批评理念。在《文化无意识:弗莱的批评理论视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中,易晓明基于对弗莱文化观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的理解,颇具创见地提出以“文化无意识”取代“神话原型”作为概括弗莱批评理论的关键词,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种替换的合理性。江玉琴和易晓明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我国文化视域中的弗莱研究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潮。

《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 1971)是弗莱批评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此前弗莱批评思想的总结,而且标志着弗莱文化整体批评的发展与成熟”^[21]。裘·阿丹姆森(Joe Adamson)亦指出“他的著作,以《批评的道路》作为开端,

预言了当前重视文化和重视艺术与社会—政治领域之交互作用的趋势。”^[22]在后期著作中,弗莱的批评关注点逐渐从建构文学批评的科学体系转向考察文学的文化和社会功能,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色彩。例如,在《神力的语言》中,弗莱就是通过界定首要关怀和次要关怀等概念来阐述神话和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弗莱认为,首要关怀指向人类本身,具体地说也就是人的生存问题;次要关怀指向社会,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弗莱看来,神话与首要关怀密切相关,而文学则处于首要关怀与次要关怀之间,起中介作用。^{[23][46-48]}随着对弗莱批评理论的深入发掘,以及受20世纪90年代刘康和谢少波论述的启发,弗莱的文化政治立场已经成为研究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就自然成为我国研究者的解读对象。易晓明综合考察弗莱在《批评之路》和《神力的语言》等著作中的观点,尝试通过解读首要关怀和次要关怀等概念,勾勒弗莱意识形态理论的框架,指出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意识形态”^[24]。在之后的《语言与文类中的意识形态指涉——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中,易晓明又从弗莱对语言的隐喻和反讽的研究以及费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弗莱的文类批评的研究两个方面,发掘了弗莱批评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资源。两篇文章前后呼应,完整展现了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与文化研究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相呼应,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批具有跨学科、跨文化属性的批评流派应运而生。文学人类学就是其中之一。整合人类共通的精神文化资源,发掘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人文内涵是文学人类学的批评旨归。而要实现这种批评旨归,就势必要通过破除学科壁垒、消解民族文学的权威话语,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对话。这是建构文学人类批评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叶舒宪是我国最早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也是最早关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学者之一。^②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叶舒宪就对弗莱的理论作出过评述。他在该书中将弗莱的批评理论定性为“文学人类学”,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神话—原型批评”。虽然他当时还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

解析弗莱批评理论的文学人类学属性,但弗莱的理论一直是他此后阐述文学人类学批评思想的重要参照。20世纪90年代末,叶舒宪进一步指出:“弗莱或许是在文艺学领域中第一个提出文学人类学设想的人。”^[25]而其《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一文的发表则表明弗莱的批评理论获得了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对其进行阐释的内在属性和学理依据,不再是对文学人类学进行说明的参照物。在该文中,叶舒宪分析弗莱看待比较文学的态度、弗莱的文学观与人类学思想的契合,以及弗莱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从学理层面上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与文学人类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26]在之后的专著中,叶舒宪进一步阐述了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批评理念,通过对比弗莱与新历史主义,揭示弗莱的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诗学的理论潜能,指出“原型理论可供文化诗学发掘和再造的层面还远没有穷尽,随着视角的切换,阐释原则的变化,原先的盲点可能转化为新的洞见。”^{[27][150]}

弗莱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位对社会文化现象有深刻洞见的思想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发掘弗莱批评理论背后的批评思想。陈萍探讨弗莱的批评思想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启示,认为“真正的批评必须能在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之间从容切换,从而深入考察文学内部结构与外部语境之间的隐蔽联系”^{[21][14]}。蒋艳萍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指出“正如弗莱格外重视对文学研究的内外兼修,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只有在‘自律与关怀’的张力中才能产生一样,中国的文化诗学也应是文学的外在研究与内在的剖析、感受完美结合的产物。”^[28]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是当下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是我国学者在新世纪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在总结我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同时也是完成“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两大课题的内在要求。“文化诗学”既脱胎于文化研究,又是对“泛文化论”的反拨和扬弃,所追求的是对文本的审美观照与文化批评宏观视野的完美结合。用童庆炳先生的话说,“‘文化诗学’力主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既重视文本作品的语言,也重视文本的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全面的理论”^[29]。弗莱的批评理论之所以能给我国的“文化诗学”建设以启示,是因为他坚信,“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

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30][10]}。

弗莱在说明自己的批评体系时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认为文学批评就好比欣赏一幅画,站得近虽可以细察笔势和笔力等细微之处,却只能囿于局部,而只有向后站,才能把握画作的整体,总揽全局。耐人寻味的是,从最初的批评概念和批评体系解析,到后来的联系本土批评语境,解读批评理论的文化内涵,我国的弗莱研究正是一个不断“向后站”、不断确立批评者主体意识的过程。回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弗莱研究不难发现,不论是对形式和内容,还是对自律和他律的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研究者反思我国文学批评实践得与失、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批评之路”的重要载体,而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弗莱的批评理论也越来越彰显出它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当然,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弗莱的批评思想,我们应该不断调整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应该将弗莱的批评理论置于加拿大文学批评的谱系中加以考察,尤其要以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当下的发展趋势观照弗莱的批评理论,因为加拿大年轻一代的批评家正在“竭力突破和超越弗莱的形式主义疆界”,转而关注“历史与架构、知识与权力、美学与政治等等之间的联系”^{[31][1-2]}。

注释:

①弗莱的译介工作在新世纪继续向前推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弗莱在哈佛大学的演讲集《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

②从“文学人类学”角度解读弗莱批评理论的研究者还有方克强和喻琴。参见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内容与前景》(《上海文学》,1992年第1期,第78—80页);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喻琴的《弗莱和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思想之比较》(《学术论坛》,2008年第3期,第62—64页)。

参考文献:

- [1]袁宪军.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综述[J].国外文学,1992(2).
- [2]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3]张隆溪. 弗莱的批评理论[J]. 外国文学研究, 1980 (4).
- [4]张隆溪.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 [5]叶舒宪.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6]盛宁. “关于批评的批评”——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 (1).
- [7]蓝仁哲. 加拿大文学在中国的接受[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6).
- [8]朱立元. 弗莱的原型批评美学[J]. 人文杂志, 1998 (6).
- [9]王逢振. 批评的剖析: 弗莱的文学观和批评观[A]//王宁, 徐燕红. 弗莱研究: 中国与西方[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0]张辉. 原型与形式——论弗莱和荣格艺术形式思想及其内在关系[A]. 王宁, 徐燕红. 弗莱研究: 中国与西方[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1]吴持哲. 从中国视角评析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学批评[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 (5).
- [12]刘康. 普遍主义、美学、乌托邦——弗莱“文学原型说”散论[J]. 中国比较文学, 1995 (2).
- [13]谢少波.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4]梁工. 圣经文学研究在弗莱批评体系中的位置[J]. 外国文学, 2010 (2).
- [15]王进芳. 对诺斯洛普·弗莱原型的误读与反思[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2).
- [16]代云红. 论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与启示[J]. 文艺理论研究, 2009 (5).
- [17]王宁. 后现代主义之后[M].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
- [18]A. C. 汉密尔顿. 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诺斯洛普·弗莱[J]. 史安斌译.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3).
- [19]程爱民. 原型批评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J]. 外国文学, 2000 (5).
- [20]王宁. 弗莱: 当代文化批评的先驱者[J]. 外国文学, 2001 (3).
- [21]陈萍. “只有批评之路敞开”——诺斯洛普·弗莱的《批评之路》[J]. 国外文学, 2001 (3).
- [22]裘·阿丹姆森. 弗莱与意识形态[J]. 徐燕红译. 国外文学, 1995 (1).
- [23]诺斯洛普·弗莱. 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M]. 吴持哲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4]易晓明. 关怀神话: 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
- [25]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 [26]叶舒宪. 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3).
- [27]叶舒宪. 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8]蒋艳萍. 论弗莱的“文学批评重构”理论[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
- [29]童庆炳. 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J]. 东方丛刊, 2006 (1).
- [30]诺斯洛普·弗莱. 批评之路[M]. 王逢振, 秦明利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1]帕米拉·麦考勒姆, 谢少波. 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M]. 蓝仁哲, 韩启群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齐昆】

Constructing a Literary “Critical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oking back at Frye Studies in China

QI 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thesis reviews Chinese scholarship on Northrop Frye since 1980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overall recep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Frye Studies in 1980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n Frye and 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research on literary theory from a political discourse to an academic one. As Chinese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deepened, Frye Studies in 1990s underwent a rapi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critical approach and vision. The potentials of Frye’s theory are further explored in the 21st centur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meanwhile, as a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with Chinese critical context, Frye’s theory and thoughts a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frame of reference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to explore ways to construct a literary “critical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rye Studies; paradigm; critical context